

# 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

袁明清 刘中民

**摘 要：**本文首先对德国的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前德国非洲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特色进行了简要总结。经研究发现，德国的非洲研究从殖民时期到当前经历了多次转向，经历了从语言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从服务于殖民主义政治化研究到后殖民时期的去政治化研究的变迁，从纯粹西方视角的以非洲为客体的研究到以本土知识为重、强调非洲主体地位的转型，其知识积累、学科设置和科学研究均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中国可借鉴德国非洲研究的经验，通过加强非洲语言文化的通识教育，夯实非洲人文与社会研究，强化非洲研究的国际化建设，以提升非洲研究的水平。

**关键词：**德国；非洲研究；历史沿革；主要机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德国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生院 博士研究生 拜罗伊特

95447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D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17)04 - 0004 - 15

德国的非洲研究兴起于殖民主义时期,服务于在非洲的殖民事业,从研究伊始就高度重视非洲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非洲研究因依附并服务于纳粹主义而在二战后受到强烈冲击。进入当代后,德国的非洲研究在英美的影响下,日益走向综合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并深度融入非洲本土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德国默克尔政府当下对非政策高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当前,中非关系的发展正处在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这无疑需要中国的非洲研究能够对非洲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准确认知,进而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更丰满、更真实的知识供给。因此,对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和机构设置进行梳理,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总结,进而分析德国非洲研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

### (一)起步阶段

德国早期的非洲研究始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且存在“白人(基督教)至上”的种族主义偏见。康德作为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个将“种族”概念引入德国学术话语体系之中的思想家。1775年,康德在《论人种的差别》一文中认为,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天赋和性格上的差别<sup>①</sup>,并且无法通过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康德把人类划分为白人、蒙古人、印度人和黑人四大类别。他认为,非洲黑人“在体力上无法承担重活,也没有勤劳的品质和领会所有文化的能力”,因此黑人属于最低一等的人种。尽管康德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种族偏见,但他却强烈反对一个种族对于另一个种族的压迫、奴役或者殖民。<sup>②</sup>

在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则认可非洲奴隶贸易的合理化<sup>③</sup>,这显然也是基于肤色和体质差别的种族歧视,同时还包含了文化和语言上的种族歧视。在这种种族主义逻辑下,只有通过欧洲殖民,将非洲本土文化和思维方式“洗白”,非洲才可以取得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在为欧洲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和从事奴隶贸易提供正当理由。在欧洲和美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野蛮的奴隶贸易发挥

<sup>①</sup> Emmanuel Kant, “On the different Races of Men,” in Emmanuel Chukwudi Eze (ed.), *Ra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p. 38–48, here p. 41.

<sup>②</sup> Emmanuel Kant, *Abhandlungen nach 1781*, Ausgabe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0, S. 176;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 8.

<sup>③</sup> Susan Arndt, „In der Zukunf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frikastudien in Bayreuth“, *Literatur Portal Bayern*, online, <https://www.literaturportal-bayern.de/blog?task=lpblog.default&id=1472>, 访问日期:2017-11-20.

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非洲不断被塑造为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等待征服的大陆,居住着劣等民族。<sup>①</sup>在殖民主义时期,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对于非洲的探索和认知多集中于非洲地理环境,习得当地语言、传播基督教文化、勘察自然资源等成为非洲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而服务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和殖民。

在德国统一前,德国传教士已开始与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传教士一起在非洲传教,在客观上支持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活动<sup>②</sup>,这也奠定了德国非洲研究与英法非洲研究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但德国非洲研究在与英法等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具有重视语言研究的鲜明特色且成绩斐然,<sup>③</sup>这源于德国神学界对于比较文字学、即语言训诂学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维也纳条约签订后,曾经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语地区在遭受战争摧残后逐渐形成了松散的联邦。在没有统一国家的情况下,许多学者以构建德国身份认同为目的,探究德语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sup>④</sup>积累了语言研究的大量经验;进而为开展非洲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第一部由英国教堂传教社(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sup>⑤</sup>出版的关于非洲语言的字典就是德语区学者用德语完成的。<sup>⑥</sup>来自图宾根的约翰·路德维希·克拉普夫(Johann Ludwig Krapf, 1810 - 1881)也是通过英国教堂传教社,先后到达当今的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蒙巴萨地区。他编辑了第一部斯瓦西里语字典<sup>⑦</sup>,并收集了大量有关非洲

① Darrel Moellendorf, "Racism and Rationality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e Spiri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3, No. 2, February 1992, pp. 243 - 255, here p. 243.

②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1814 - 19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 10.

③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Africa Spectrum*, Vol. 40, No. 3 (2005), pp. 403 - 427, here p. 405.

④ 同注②, p. 8.

⑤ 该组织于1799年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基督教福音派在世界的传播,足迹遍布亚非大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其第一批传教士经柏林神学院(Berlin Seminary)培训后于1804年出发前往西非。<https://www.churchmissionsociety.org/our-history>, 访问日期:2017-11-20.

⑥ 来自拉托维亚的德裔古斯塔夫·尼兰德(Gustavus Nylaender)于1806年跟随教堂传教社到达塞拉利昂,1812年移居到布隆海岸(Bullom Shore)。1814年,他根据在布隆海岸的经历和对当地语言的习得和了解,写成了第一部由德国传教士完成的非洲语言语法字典《布隆语语法及词汇》(*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Bullom Language*),此后,德国传教士多效仿尼兰德,对非洲当地语言进行记录,从而便于继任者在当地继续传教。同注②, p. 21.

⑦ Johann Ludwig Krapf, *Vocabulary of Six African Languages (Kisuaheli, KiNika, Kikamba, Ki Pokomo, Ki Hiau, Ki Galla)*, Tuebingen: Lud. Fried R. Fues, 1850, [https://archive.org/stream/cu31924026933139/cu31924026933139\\_djvu.txt](https://archive.org/stream/cu31924026933139/cu31924026933139_djvu.txt), 访问日期:2017-12-05.

语言的数据<sup>①</sup>。现今德国在肯尼亚的大使馆建筑即以克拉普夫命名。此时,有关非洲语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当地语言的习得和对于非洲口头语言向书面文字的转译<sup>②</sup>,另一方面,基于德国学者一直以来将语言作为文化价值观的产物,由语言所引申出的有关地理、民俗、植物和动物的相关知识也是传教士记录的对象。然而,传教士基于圣经文本和种族主义观点对非洲语言的分类,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其突出表现是把非洲语言视为落后于欧洲语言的低等语言。<sup>③</sup>

除了有关非洲语言的记录和研究,非洲大陆的地理环境也是德国传教士和探险家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些知识不仅可以为德国商品提供市场和原材料方面的信息,还可以为日后的殖民扩张做准备。此时的地理学可以说是有关征服和剥削的地理学。<sup>④</sup>其中比较著名的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 1821 - 1865)曾在英国的赞助下,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乍得湖以南地区,其著作《1849 - 1855年北非和中非地区游记和发现》<sup>⑤</sup>是有关地区现存最详尽的记录之一<sup>⑥</sup>。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哈兹尔(Friedrich Ratzel, 1844 - 1904)被认为是人类地理学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sup>⑦</sup>,第一次将地理学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也被视为“地缘政治(Geopolitik)”的发端。虽然哈兹尔的研究主要基于其在美洲的游历,但其理论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德国非洲研究。

尽管有大量来自德语区的传教士和商人在非洲活动,但是,当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于1871年完成统一之际,德国基本上在非洲没有殖民地。这决定了德国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在非洲的活动与英法当局保持着密切合作,很多德国传教士在非洲用英语传教。同时,对于非洲知识的积累多是零散的,是出自个人兴趣的记录

① Clarrisa Vierke, „Zur Forsch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frikanistik, ihre Anfänge und Ausrichtung, am Beispiel der Swahili-Forschung“, in Michel Espagne/Pascale Rabault-F Feuerhanh/David Simo (Hrsg.), *Afrikanische Deutschland-Studien und deutsche Afrikanistik*, Würzburg: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GmbH, 2014, S. 73 - 92, hier S. 74.

② Michel Espagne/Pascale Rabault-F Feuerhanh, „Einleitung“, in Michel Espagne/Pascale Rabault-F Feuerhanh/David Simo (Hrsg.), *Afrikanische Deutschland-Studien und deutsche Afrikanistik*, S. 13 - 19, hier S. 14.

③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1814 - 1945*, p. 8.

④ Sebastian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Story*, translated by Sorcha O' Hag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28.

⑤ Heinrich Barth, *Reisen und Entdeckungen in Nord- und Central-Afrika in den Jahren 1849 bis 1855*, Gotha: Justus Perthes, 1858.

⑥ The Editors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Heinrich Barth”,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ctober 03, 2011,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einrich-Barth>, 访问日期:2017 - 12 - 05.

⑦ Friedrich Ratzel, *Der Lebensraum: eine biogeographische Studie*, Tübingen: H. Laupp, 1901, S. 5.

或是宗教信仰驱动下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整体上德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尚十分有限<sup>①</sup>,不过,这些有关非洲的第一手资料,从舆论方面对德国在非洲进行殖民发挥了动员作用。<sup>②</sup> 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赋予了德国染指非洲的机遇,会议上所签署的《柏林条约》标志着德国第一次全面参与殖民进程,<sup>③</sup>而德国对非政策的转变也促进了非洲研究正式进入德国学界。

## (二) 殖民时期

在柏林会议三年后的188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ät, 现洪堡大学)开设东方语中心(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该中心除了教授中文、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还开设包括斯瓦西里语在内的非洲语课程。这是德国第一个教授非洲语言和文化的学术院系,标志着德国非洲研究从非洲边远地区的田野经验转向大都市高校教学与科研。但是,正如19世纪德国高校的东方语学系主要关注翻译神学文本及其在东方的传播,隶属于东方语系的非洲语言研究也主要服务于德意志帝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基督教传教事业,以及贸易管理和政治宣传。柏林东方语中心在建立之初,基本上作为德国外交部的分支,教授德国在非殖民地或者贸易区所使用的语言,其学生包括即将前往非洲殖民地的商人、庄园主、殖民军官、外交官以及翻译人才<sup>④</sup>。柏林东方语中心的第一位斯瓦西里语老师卡尔·布特纳(Carl Gotthilf Büttner, 1848-1893)曾在非洲西南部、当今纳米比亚地区传教,且回到德国之后在英国传教士爱德华·斯蒂尔《斯瓦西里语练习册》的基础上,编纂了第一部德语斯瓦西里语语法书(*Hülfsbüchlein*, 1887)以及斯瓦西里语字典。在他的主导下,《非洲语言杂志》(*Zeitschrift für Afrikanische Sprachen*)于1886年创刊,该杂志既为传教士和学者提供了讨论非洲和非洲语言的平台,也为没有语言学背景的商人和殖民者提供了行为手册<sup>⑤</sup>。

布特纳之后,卡尔·曼霍夫(Carl Meinhof, 1857-1944)成为柏林东方语中心非洲语言教师,并且在喀麦隆人第伯恩(Njo a Dibone)的翻译和帮助下,凭借其专著《班图语的语音学大纲》(*Grundriss einer Lautlehre der Bantusprachen*, 1899)成为德国殖民时期最重要的非洲学者。他不仅在该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如何转录已知和未知的班图语词汇,还尝试将各种独立的非洲语言进行比较和联系,从而较为全面

<sup>①</sup> Felix Brahm/Adams Jones, *Afrikanistik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1409-2009*,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GmbH, 2009, S. 295.

<sup>②</sup> Anonymous, *German Colonization*,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20, p. 24.

<sup>③</sup> 同上, p. 39.

<sup>④</sup> Ursula Wokoek, "Reviews of Book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Issue 1, February 2013, pp. 270-271, here p. 270.

<sup>⑤</sup>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1814-1945*, p. 65.

地描述了班图语系(Urbantu)的特点<sup>①</sup>。尽管曼霍夫曾经尝试避开欧洲中心的研究模式,根据非洲语言自身的特性进行评估,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仍囿于种族主义思想,认为种族概念在维持社会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sup>②</sup>,而这也影响了他对非洲语言的分类和理论构建。1909年,曼霍夫转至刚刚成立的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s Kolonialinstitut,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名为汉堡大学),与研究苏丹语、曾在多哥地区传教的传教士狄德力西·韦斯特曼(Diedrich Westermann,1875-1956)合作进行非洲语言以及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自此,汉堡成为柏林之后德国非洲研究的另一重镇。与此同时,莱比锡大学也开始进行服务于德国海外殖民的非洲语言学、殖民地理学(Kolonialgeographie)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sup>③</sup>。

在语言学之外,曼霍夫与人类学家菲力克斯·冯·卢尚(Felix von Luschan,1854-1924)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密切往来和交流。这不仅仅限于语言学和人类学内有关非洲第一手资料的交换和借鉴,还包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合作。两人都关注于非洲不同族群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其合作课题包括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地区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含米特语,以及中非地区的俾格米人(Pygmies)<sup>④</sup>。同时,曼霍夫有关班图语的理论也受到文化人类学家莱奥·费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1873-1938)的影响。费罗贝纽斯作为哈兹尔的学生,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他通过在非洲丰富的游历经历,以及对于非洲文物和宗教机构分布的了解,在哈兹尔有关文化扩散和人类迁徙的理论上,提出了“文化圈(Kulturkreis)”的概念<sup>⑤</sup>。费罗贝纽斯认为,例如弓箭等文化产物所反映出的世界观和文化是研究的中心,而非仅仅文物本身。费罗贝纽斯对于非洲文化和历史的记录和洞见,影响了塞内加尔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和日后黑人传统精神运动(Négritude)<sup>⑥</sup>。费罗贝纽斯和曼霍夫的研究和理论凸显出两种不同的思潮。一是着重于歌曲、神话、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

①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1814-1945*, p. 74.

② 同上, p. 88.

③ Felix Brahm/Adams Jones, *Afrikanistik,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1409-2009*, S. 295.

④ 同注①, p. 100.

⑤ Michael Goldstein/Gail King/Meghan Wright, "Diffusionism and Acculturation",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http://anthropology.ua.edu/cultures/cultures.php?culture=Diffusionism%20and%20Acculturation>, 访问日期:2017-12-05.

⑥ Jürgen Zwernemann, "Leo Frobenius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Africa", *Research review: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3 (2), 1967, pp. 2-20, here p. 2.

所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精神,另一种则是从自然学科而来,对于文化根据语法和结构进行归类的研究方法<sup>①</sup>。虽然两者在一些话题上存有分歧,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互相借鉴、互相补充。

在学科名称上,此时的德国非洲研究多以“非洲语研究(Afrikanistik)”命名,一方面与东方语(Orientalistik)研究相对应,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其本身综合语言、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跨学科性质<sup>②</sup>。截至此时,德国非洲研究依然充满了种族歧视色彩。非洲语言被分为“含米特语(Hamitic)”“班图语(Bantu)”以及“苏丹语(Nigritics/Sudanic)”<sup>③</sup>。含米特语因为和欧洲语言相似而被视为最先进的语言,班图语次之,而苏丹语则被视为非洲最原始部落的语言。对非洲语言的历史追溯、分类以及横向比较,直接影响了对非洲的地理、文化和族群的分类。但是,对于非洲当地族群和语言的分类实质上是将非洲视为可以被拆分和控制的物体,而并非活动和变化中的族群。这种将原本边界模糊、并不可分的人类活动进行分类,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人为地加剧了非洲的族群分裂。这导致了日后非洲(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顽疾,也是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仇杀悲剧的历史根源之一。德国非洲研究仍然是“非常露骨的‘白色’占领‘黑非洲’的故事”<sup>④</sup>。

### (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已经丧失了非洲所拥有的殖民地,这对服务于德国殖民主义的非洲研究造成了强烈冲击。尽管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非洲研究并没有停止,并与英国和法国有密切的合作。1919年曼霍夫成为汉堡大学非洲语系主任,六年之后的1925年,曼霍夫之前的同事狄德力西·韦斯特曼则继任为洪堡大学非洲语系主任。韦斯特曼于1911年出版了有关苏丹语的著作<sup>⑤</sup>,将尼日尔河刚果地区和尼罗河南撒哈拉地区的语言进行对比,提出“苏丹语系(Ursudan)”。他将自己的语言能力视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以期影响教育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发展<sup>⑥</sup>。1927年,韦斯特曼被任命为伦敦非洲语言和文化国际机构

<sup>①</sup>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p. 409.

<sup>②</sup> Ekkehard Wolff, *Was ist eigentlich Afrikanistik?*,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 2013, S. 17.

<sup>③</sup>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1814-1945*, p. 98.

<sup>④</sup> 同上, p. 116.

<sup>⑤</sup> Diedrich Westermann, *Die Sudansprachen: eine sprachvergleichende Studie*, Berlin: De Gruyter, 1911.

<sup>⑥</sup> 同注<sup>①</sup>, p. 41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London)的负责人,开设了非洲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课程。韦斯特曼的同事理查德·特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 1869 – 1954)根据他 1930 年左右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调查结果,结合法国社会心理学、德国文化历史研究以及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得出了欧洲和非洲文明在东非地区的交流推动了新文明产生的结论,并认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即退守、模仿、死亡(Völkertod)、恢复,是一个新老交替变化的过程<sup>①</sup>。

伴随一战后德国右翼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抬头,很多非洲研究学者转而寄希望于纳粹政权,希望其能够控制欧洲,进而夺取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从而使非洲研究学科能够继续为帝国服务,实现其为国家服务的目的<sup>②</sup>。包括曼霍夫在内的众多非洲研究学者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的成员,甚至在许多公共场合举办演讲和讲座,为纳粹政权背书。在这期间,整个德国非洲研究处于“黑暗中的沉默”状态<sup>③</sup>。事实上,此前德国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中的“种族优劣论”即是纳粹政权奉行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前身。在二战结束前,非洲研究一直都志在服务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事业,因而一直关注与殖民开拓息息相关的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而非洲历史、文学、艺术在德国非洲研究创立后的一百余年里都鲜有涉及。这是因为当时德国学界、媒体乃至民众都普遍认为“劣等”的非洲民族并不存在文明。<sup>④</sup>

####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二战后,德国非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重组和变革<sup>⑤</sup>。一方面,二战后大部分德国的非洲研究学者都曾因参与纳粹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sup>⑥</sup>例如,由于大部分教授因支持纳粹而被撤职接受调查,莱比锡大学的非洲研究系规模急剧缩减,一度被合并到东亚语系。另一方面,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德国高校系统恢复运作,德国高校非洲学系在承袭战前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重建工作。<sup>⑦</sup>例如,在汉堡大学,曾经在 1936 年接任曼霍夫担任系主任一职的奥古斯特·克林恩黑本

<sup>①</sup>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pp. 412 – 413.

<sup>②</sup> Ursula Wokoeck, “Reviews of Books,” p. 271.

<sup>③</sup> Walter Dostal, “Silence in the Darkness: German Ethnology dur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eriod”, *Social Anthropology*, Vol. 2, No. 3 (1994), pp. 251 – 262, here p. 251.

<sup>④</sup> Susan Arndt, „In der Zukunf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frikastudien in Bayreuth“.

<sup>⑤</sup> 同注<sup>①</sup>, p. 412.

<sup>⑥</sup> Felix Brahm/Adams Jones, *Afrikanistik,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1409 – 2009*, S. 303.

<sup>⑦</sup> 同注<sup>①</sup>, p. 415.



(August Klingenheben, 1886 - 1967)继续担任该职至1954年;在柏林大学,1947年由韦斯特曼重新担任东方语系主任<sup>①</sup>。曼霍夫曾经的助教达曼(Ernst Dammann, 1904 - 2003)在作为战俘被美军关押两年后被返聘至洪堡大学,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和马尔堡大学任教。这些变动也意味着新思想的崛起不会来源于传统的非洲研究领域,如语言学和人类学,而是与这些学科相关的“边缘”学科。加之冷战的形成以及非洲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兴起,非洲研究也伴随去殖民化的兴起进入到多领域的后殖民研究,非洲文学研究的兴起成为德国非洲研究领域在二战后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亚汉斯·雅恩(Janheinz Jahn, 1918 - 1973)、乌利·拜尔(Ulli Beier, 1922 - 2011)、埃克哈德·布莱汀克(Eckhard Breitinger, 1940 - 2013)等。其中,雅恩早年从事戏剧、艺术史和阿拉伯语专业研究和教学,在1951年偶然聆听了塞内加尔著名诗人和政治家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在法兰克福法语中心的讲座后,转而走上非洲艺术和文学研究之路,以及对非洲文学作品孜孜不倦的收集和翻译工作。<sup>②</sup>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亚里欧妮·迪奥普(Alioune Diop)于1947年创立了《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期刊,先后发表了艾梅·塞泽尔、桑戈尔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泛非运动(pan Africa)、前法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以及“黑人传统精神”文艺复兴运动。雅恩还被桑戈尔任命为塞内加尔荣誉领事,他最重要的出版物《蒙图:新非洲文化概要》(*Muntu: An outline of neo-African Culture*)与其说是科学研究,不如称为政治宣言,描绘了从非洲到南美,包括文学、舞蹈、音乐、诗歌和宗教在内的充满活力的非洲艺术图景。

乌利·拜尔也是德国非洲文学艺术研究中的重要一员。1957年,他在尼日利亚创立出版了期刊《黑俄耳普斯》(*Black Orpheus*),它成为以东非和南非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英语期刊。该期刊当时在尼日利亚影响颇广,在中产阶级群体中甚至达到人手一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6年)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也曾担任该期刊的主编,但是这本刊物后来受多种原因影响于1975年停刊。回到德国后,拜尔利用个人收藏的非洲艺术品,在拜罗伊特大学建立了非洲艺术中心(Iwalewahauss),主要进行有关非洲文学艺术的教学和研究。该中心的名称“伊瓦雷瓦(Iwalewa)”源于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语(Yorùbá),意为“品质即为美(character is beauty)”,该中心主要关注现当代非洲及非洲离散族裔艺术品的收藏、展览,并为非洲当代艺术家提供作品展示平台,同时开设非洲艺术专业,进行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埃克哈

<sup>①</sup>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p. 415.

<sup>②</sup> 同注<sup>①</sup>, p. 416.

德·布莱汀克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也极具代表性,他所创办的关于非洲文学的期刊使其成为当时非洲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20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非洲研究仍然主要关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研究。尽管学科之间有一定的交流,但并不存在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或交流平台。直到1969年“非洲研究德国协会(Vereinigung für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VAD)”在部分年轻非洲研究学者的倡导下在马尔堡成立,才实现了非洲研究的首次跨学科合作。该协会名称将德国放在最后有其特殊考虑,旨在避免外界将非洲研究理解为服务于德国政府的学科,因而并未使用诸如“德国非洲研究协会(Deutsche Vereinigung von Afrikanisten, Vereinigung von deutschen Afrikanisten)”等名称<sup>①</sup>。这同时也体现了鼓励德国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研究领域进行合作的导向。与此同时,非洲研究的名称从“非洲语研究(Afrikanistik)”变成“非洲研究(Afrikawissenschaften)”,与英美的区域研究(African studies)相对应,立足于文化和社会研究,而曾经作为非洲研究中心的语言研究则变为边缘学科。尽管VAD成立的目的在于打破学科藩篱,加强不同学科围绕非洲研究进行国内和国际合作,但是在实践上却加深了德国学界非洲语研究和非洲研究之间的隔阂<sup>②</sup>。双方不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导致研究结果不能互相交流,同时基于书面资料的区域研究有重陷欧洲中心主义的危险。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VAD的内部冲突中。几位初创VAD的非洲语研究学者,因不满VAD未能提供一个可有效地促使跨学科真诚交流的平台,并且认为其他学科研究者总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sup>③</sup>,而退出VAD,并在1978年成立专门面向非洲语学者的非洲语论坛(Afrikanistentag),每两年举办一次。

VAD的成立标志着德国非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sup>④</sup>,德国的非洲研究开始向区域综合研究转型,提倡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同时重新审视殖民时期所积累的知识,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重塑,鼓励从当地视角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尽管当时围绕非洲研究是否应该服务于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分歧,但德国非

<sup>①</sup> Felix Brahm, *40 Jahre Vereinigung für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VAD), 1969 – 2009*, Hamburg: VAD, 2009, S. 2.

<sup>②</sup> Ekkehard Wolff, „Sprache als Schlüssel — Sprache als Ressource. Eine Positionsbestimm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Afrikanistik“, in Michel Espagne/Pascale Rabault-Ferhmann/David Simo (Hrsg.), *Afrikanische Deutschland-Studien und deutsche Afrikanistik*, S. 19 – 48, hier S. 24.

<sup>③</sup> William Möhlig, „Zur Methode der afrikanistischen Afrikanistik“, in Brigitta Benzing/Reinhardt Bolz (Hrsg.), *Methoden der afrikanistischen Forschung und Lehre in der BRD*, Hamburg: Buske, 1976, S. 163 – 184.

<sup>④</sup>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p. 416.

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此外,德国非洲研究还开始更广泛地吸收本土的非洲人参与研究,注重和鼓励非洲本土学者进行非洲研究。在1975年悼念亚汉斯·雅恩的VAD会议上,来自尼日利亚伊巴丹的阿比欧拉·伊瑞拉(Abiola Irele)等非洲人士出席了会议<sup>①</sup>。在各高校内,来自非洲的学者在德国非洲研究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非洲研究德国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其会议主题(详见下表1)从最初对非洲知识积累的历史梳理和反思、对非洲研究方法的探讨,发展到现如今对于非洲发展和未来的展望,并且涉及政治、移民、宗教、环境、科技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非洲研究综合性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

表1 VAD历年会议主题(1969-2018)<sup>②</sup>

| 时间               | 主题                                | 地点      |
|------------------|-----------------------------------|---------|
| 1969年7月18日-7月20日 | 非洲研究内部跨学科研究合作的问题和可能性              | 马尔堡     |
| 1970年7月16日-7月19日 | 关于“非洲性”的写作:桑格尔,<br>“黑非洲”审美以及阿鲁沙宣言 | 伯斯代尔    |
| 1971年            | 非洲少数民族融合进程                        | 圣奥古斯汀   |
| 1972年6月3日-7月2日   | 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                         | 阿诺德善    |
| 1973年5月31日-6月2日  | 西德非洲研究和教学方法                       | 高斯塔德-道恩 |
| 1975年4月7日-4月8日   | 关于亚汉斯·雅恩思想的研讨会                    | 美因茨     |
| 1976年6月17日-6月19日 | 作为非洲研究对象的非洲历史                     | 不来梅     |
| 1979年6月30日-7月1日  | 西德媒体和节日中的非洲形象                     | 柏林      |
| 1982年1月15日-1月17日 | 非洲独立20年非洲精英分化                     | 美因茨     |
| 1984年6月13日-6月16日 | 1884-1984:在非一百年                   | 汉诺威     |
| 1986年12月4日-12月7日 | 非洲政治发展的危机                         | 柏林      |
| 1989年5月3日-5月6日   | 非洲当下和未来视角                         | 不来梅     |
| 1991年5月9日-5月11日  | 非洲:环境危机下的生态生存,昨天、今天、明天            | 汉堡      |
| 1993年5月20日-5月22日 | 非洲自助:独自管理的过程和机构                   | 美因茨     |
| 1995年4月28日-4月30日 | 非洲的国家和社会:退化和改革进程                  | 杜伊斯堡    |

<sup>①</sup> Felix Brahm, *40 Jahre Vereinigung für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VAD), 1969 - 2009*, S. 11.

<sup>②</sup> 参见 VAD, „Tagungen“, Vereinigung für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http://vad-ev.de/en/vad-conferences/past-conferences/>, 访问日期:2017-11-20.

续表 1

| 时间                | 主题                 | 地点       |
|-------------------|--------------------|----------|
| 1996年10月3日-10月6日  | 非洲与他者:改变与创新        | 柏林       |
| 1998年10月8日-10月10日 | 非洲与全球化             | 拜罗伊特     |
| 2000年3月30日-4月1日   | 非洲 2000            | 莱比锡      |
| 2002年5月23日-5月26日  | 多面非洲:独角戏的终结?       | 汉堡       |
| 2004年6月2日-6月5日    | 大背景下的非洲与世界历史和当下的互动 | 汉诺威      |
| 2006年7月24日-7月27日  | 非洲的知识和知识构建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 2008年5月14日-5月17日  | 边境和越境              | 弗莱堡      |
| 2010年             | 持续和断层:非洲独立五十年      | 美因茨      |
| 2012年             | 危机四伏的空间和争议中的秩序     | 科隆       |
| 2014年             | 未来非洲               | 拜罗伊特     |
| 2016年             | 资本主义与非洲关系反思        | 柏林       |
| 2018年             | 非洲和全球的联系           | 莱比锡      |

来源:作者自制。

在东西德统一之前, VAD 主要面向联邦德国的非洲研究。民主德国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柏林洪堡大学、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以及民主德国科学研究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作为民主德国非洲研究的中心, 主要致力于培养可以在不同领域和非洲合作的学生, 进行撒哈拉以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以提高民主德国群众对于新非洲的了解, 促进民主德国和撒哈拉以南独立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sup>①</sup>。其研究范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 受到苏联科学主义的影响, 秉承着与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观念, 从 60 年代关注于反种族主义、反殖民和反新殖民主义, 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解放运动, 到 70 年代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 出于对毛泽东思想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恐惧, 而反毛泽东思想<sup>②</sup>。相比之下, 柏林洪堡大学在民主德国时期, 被定义为非官方性研究机构, 因而仍主要关注于非洲语言教学和研究。

#### (五)1990 年至今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 东西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恢复在非洲研究上的交流

<sup>①</sup> H. J. Weinhold, “African Studies at Karl Marx University, Leipzig”,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6, No. 3, 1968, pp. 411 – 414, here p. 411.

<sup>②</sup> Ulrich van der Heyden, *Die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Eine akademische Disziplin zwischen Exotik und Exempel*, Hamburg: LIT Verlag Muenster, 1999, S. 67.

与合作,然而,由于研究主题和兴趣并不十分相近,使得德国非洲研究并没有整体上的独特之处,或者说,与英美的区域研究差别不大。不过,德国的非洲研究仍保持了历史梳理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部横纵向对比的视角<sup>①</sup>,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简称DFG)在推动德国非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德国非洲研究更加注重社会问题的研究,且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sup>②</sup>。德国科学基金会是独立管理的学术基金会,其资金主要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其资助对象不受学科和国别的限制,旨在鼓励跨学科、跨地区的合作研究项目。其下属的合作研究中心(Sonderforschungsbereiche)可以支持最长达12年的非洲研究项目<sup>③</sup>,这使得德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有足够的时间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研究,而管理的相对集中则可以保证项目的成功运作。近20年来,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重要项目包括“身份认同在非洲”(1984-1997)、“热带农业及西非当地农业”(1985-2000)、“西非草原自然空间的文化发展和语言历史”(1988-2002)、“非洲干燥气候下的文化和土地变迁:自然条件下的发展轨迹”(1995-2007)、“文化和语言交流:东北非和西亚历史争议地区的变化过程”(1997-2008)、“非洲社会断层及其应对”(1999-2003)、“在全球化影响下的非洲当地行为研究”(2000-2007)、“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手稿文化”(2011)等,这些科研项目都充分反映了德国非洲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突出特点。

## 二、当今德国非洲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特色

目前,德国高校的非洲研究机构有七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的属于第一代,包括柏林洪堡大学亚非中心、汉堡大学亚非研究中心和莱比锡大学非洲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属于第二代非洲研究机构,包括法兰克福大学非洲跨学科研究中心(前身在马尔堡大学)、科隆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美因茨大学民族志和非洲研究中心。

相对来说,洪堡大学和汉堡大学作为拥有较长非洲研究历史的高校,沿袭了殖民主义时期的院系设置,将亚洲研究和非洲研究作为欧美地区以外的区域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因遗留下了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痕迹而受到诟病,但也便于德国的亚非研究机构与亚非地区交流互动,加强学科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洪堡大学多是从文学、文化、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出发,侧重

<sup>①</sup>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p. 418.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注<sup>①</sup>, p. 419.

于地方和全球性知识的建构,近几年的研究重点包括非洲伊斯兰教、媒体、社会变革三个与当前非洲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sup>①</sup> 具有同样历史的汉堡大学则多注重非洲尤其是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研究,目前主要关注濒危语言的分析 and 记录<sup>②</sup>。此外,设在汉堡的“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院(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是德国高校系统外最大的地区研究和地区比较研究机构,研究对象涵盖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区域。

在冷战、非洲独立和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努力争取更多的非洲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处于东德地区的莱比锡大学更加注重研究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sup>③</sup>。近年来,莱比锡大学在重视非洲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同时,还关注非洲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近几年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于非洲和平安全问题,以及科技创新对于非洲社会秩序的影响和破坏等。<sup>④</sup>

1975年建立的拜罗伊特大学并没有延续德国以非洲语言为重点的研究传统,转而注重跨学科、多学科、跨地区的交叉研究。其研究领域不限定或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而是包含自然科学、地理、法律、经济、语言、文学、历史和社会文化等18个学科领域。因而,拜罗伊特大学在非洲研究的命名上运用了“*Afrikanologie*”,即非洲民族志研究,将语言学之外的学科纳入研究体系。此外,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内,来自非洲的教师和生源都必须保有一定比例,以加强其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非洲当地化,打破西方为主的话语体系,建立更贴近非洲当地的知识架构。通过非洲人进行非洲研究,意味着德国非洲研究从以非洲为客体向以非洲为主体的转变,即从殖民研究到后殖民研究、从不平等关系到平等对话的转变,其目标是立足非洲当地,充分调动非洲当地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加强研究的当地化和实践性。与拜罗伊特大学相似,法兰克福大学和科隆大学同作为第二代非洲研究中心,其名称设置也是偏向于英美的区域研究,并鼓励跨学科合作,其课题多从语言学、文学研究出发,延伸到历史、文化、考古、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

<sup>①</sup>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Institut für Asien- und Afrikawissenschaften, „Forschungsprojekte“, <https://www.iaaw.hu-berlin.de/de/forschen/projekte/projekte>, 访问日期:2017-11-20.

<sup>②</sup> Universität Hamburg, Abteilung für Afrikanistik und Äthiopistik, „Forschung“, <https://www.aai.uni-hamburg.de/afrika/forschung.html>, 访问日期:2017-11-20.

<sup>③</sup> Felix Brahm/Adams Jones, *Afrikanistik,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1409 - 2009*, S. 305.

<sup>④</sup> Universität Leipzig, Institut für Afrikastudien, “Projects areas: Afric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History & Culture in Africa,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http://afrikanistik.gko.uni-leipzig.de/index.php/en/projekte-en>, 访问日期:2011-11-20.

### 结语：德国非洲研究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启示

德国非洲研究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经历了多次转向，经历了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从服务于殖民主义政治化研究到后殖民时期的去政治化研究，从纯粹西方视角的非洲客体研究到以本土知识为重的非洲主体研究的转型，其知识积累、学科设置和科学研究均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相对而言，中国的非洲研究则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其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均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有着巨大的差距。当前，中国的非洲研究仍主要关注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历史、地理、法律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毋庸置疑，这有助于通过上述学科领域的宏观研究，服务于中国的对非政策和中非合作，但同时也存在学科单一且彼此孤立，重宏观轻微观，重政治、经济和安全，轻社会、语言、文化等弊端，与非洲本土的交流和合作尤其是合作研究则更显不足。虽然中国学者在非洲研究著作出版、跨学科研究和田野调查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都有长足的进步<sup>①</sup>，但是中国非洲研究的深耕细作仍有很多方面迫切需要加强。

德国非洲研究的注重人文研究和学科交叉、强调非洲主体地位的研究优势表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应更多从非洲当地的问题和需求出发设计研究议题，尤其要重视对非洲社会的研究，重视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的构建，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非洲社会，增进中非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非洲研究应转向“以非洲为本”，深入研究非洲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和结构，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更好地理解非洲。如此一来，才能使中国的非洲研究在非洲有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进而从“软实力”构建方面服务于中非关系的发展。

责任编辑：郑春荣

---

<sup>①</sup> Anshan Li,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Brazil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2, (Dec. 2016), pp. 48-88, here p. 73.

## INHALTSANGABE

###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Afrikastudien in Deutschland**

**Yuan Mingqing/Liu Zhongmin**

Der Überblicksartikel befasst sich mit 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Afrik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owie ihren wichtig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mit dem jeweiligen Profil in der Gegenwart. Es zeigt sich ein durch vielfache Umorientierungen gekennzeichnetes Forschungsfeld, das sich disziplinär von der sprachzentrierten Afrikanistik hin zur Inter-, Trans- und Multidisziplinarität entwickelt hat. Ideologisch ist es aus der anfänglichen politischen Forschungsarbeit im Zeichen des Kolonialismus entpolitisierte Wissenschaft des Post-Kolonialismus geworden. Entsprechend vollzog Afrika einen Wandel vom einstigen Objekt in der westlichen Perspektive zum Akteur mit indigenem Wissen. In Anbetracht des akkumulierten Wissens, d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und der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 weisen die Afrikastudien in Deutschland bereits Systemcharakter auf. Die deutschen Erfahrungen sind für die chinesischen Afrikastudien insofern aufschlussreich, als die allgemeine Bildung afrikanischer Sprachen und Kulturen, die Forschung gesellschaftlich-kulturell relevanter Themen sowie die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r Forschungslandschaft zur Stärkung der chinesischen Afrikastudien beitragen könnten.

### **Eine Studie zur Beziehung zwischen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und Terroranschlägen in der EU**

**Li Yibin**

Seit dem Ausbruch der Flüchtlingskrise nehmen auch Terroranschläge in der EU offensichtlich zu. Eines der Themen, die im Fokus der öffentlichen Diskussion stehen, ist die Beziehung zwischen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und Terroranschlägen, deren Aufklärung zur Voraussetzung für die Aufhebung der Notsituation gehört, in der sich die EU zurzeit befindet. In der Studie wird die Anzahl der Terroranschläge in der EU als die abhängige Variable, die Anzahl der Asylsuchenden sowie andere gesellschaftliche, wirtschaftliche, demographische und militärische Daten als die unabhängigen Variablen in einer Korrelationsanalyse verwendet. Mit Hilfe des SAS-Programms werden die mehr relevanten unabhängigen Variablen in die multiple lineare Regressionsrechnung